



新观察

文学传统与新变中的“燕赵”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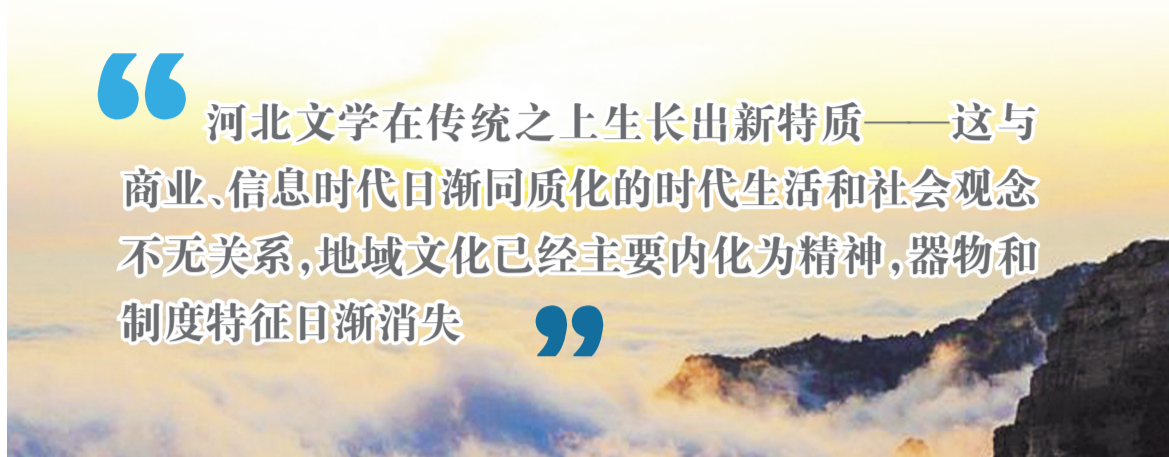
□ 杪 楞

文学既是文化生产的内容,也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文化的诸多特征进入文学中,成为文学性的一部分,同时文学也在为文化创造丰富的意义形式,例如作为审美表达方式的象征和隐喻系统等。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也是历史现象,由于族群的生活总是发生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文化和文学与地域之间存在着必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地方文化及其精神伴随着作者的文化身份和所书写的内容进入文学之中,成为文学创作无法摆脱的因素。从《荷马史诗》到《诗经》,从《巴黎圣母院》《百年孤独》到《红楼梦》,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学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表征。文化的生成来自于历史的积淀,它的变化是缓慢的,无数人生存其中,代代传承。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个体的心理结构,都是文化长期浸染的结果。

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的广袤土地上形成了五彩缤纷的地域文化,也直接影响到与之有关的文学风格的形成——《诗经》的“北方性”与《楚辞》的“南方性”为我们所熟知;当代作品也不乏其例,金字澄描写上海市井生活的《繁花》与贾平凹以家乡生活为背景的《秦腔》艺术风格大相径庭。在这一视域下观察河北文学,地方文化与从古今的文学创作形成了同构关系。自韩愈在《送董邵南序》中写下“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后,“慷慨悲歌”就成为如今河北地域(战国时代的燕、赵疆域包括了今天的河北、京津、山西、辽宁等地)文化精神的标志性概括,同时也作为一种文化审美风格成为影响和塑造文学的重要因素。

地域性格的形成与人的生活环境不无关系。一方面,燕赵多山、四季降水不均而缺少可耕地,再加上漫长的冬季,人需要合作对抗自然的威胁才能生存;另一方面,在以中原和关中为政治中心的历史时代,这里是农耕和游牧区的分界线,胡汉杂居,宋辽时期更是国防前线,频繁的战乱既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灾难,也培养了他们的生存智慧和斗争精神。久而久之,生活在燕赵大地上的人形成了团结务实、坚毅勇敢、勤劳朴实、任侠尚义的性格和家国天下的理想情怀。元代以后政治中心移往北京地区,直至进入现代社会,政治力量带动河北地域文化逐渐主流化,其中包括文学观念。从荆轲《易水歌》的苍凉悲怆到曹操诗中的沉郁雄浑,再到关汉卿雄健真率的曲作,“燕赵风骨”一直是流溢其间的内在气质,为后来的河北文学提供了丰厚的滋养。历代河北作家以个性化的审美观照不同时期的现实生活,创作出一部部精彩之作;在文化和身份的认同中展开对以“慷慨悲歌”为主要特质的燕赵文化精神的继承和创造,在时代变化中为“燕赵风骨”赋形和赋义。

河北作家关注社会生活,且对现实的处理多采用“反映”的方法,因此批评家多是在现实主义脉络上讨论河北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后的河北文学。王力平认为河北“有悠久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郭宝亮认为“河北文学的底色是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十分鲜明地体现了坚守现实主义创作特色”又融汇创新的发展路径”;崔立秋更认为“河北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上溯至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诗经》”。河北作家对此



“河北文学在传统之上生长出新特质——这与商业、信息时代日渐同质化的时代生活和社会观念不无关系,地域文化已经主要内化为精神,器物 and 制度特征日渐消失”

也不否认,关仁山即表示“会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继续前行”。从文学精神和所使用的创作技巧上来看,这些论断将河北文学的主流传统提炼为现实主义——这也为作家的自我认同提供了参照系。

文学作品通过艺术形象和所呈现的社会生活内容,为读者提供着关于河北地域生活和燕赵文化精神的基本想象。作为自古以来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乡村题材在河北经久不衰并诞生了一批佳作。何玉茹的《前街后街》、胡学文的《有生》、关仁山的《日头》《金谷银山》、康志刚的《天天都有大太阳》《滹沱人家》等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河北农村生活和农民的精神世界。尽管主题不尽相同,但从不同角度表现了燕赵儿女所遭受的磨难、强烈的求生愿望、对自然与社会现实的反抗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此置于描写乡土文化和农民生活的生动画卷中,生发出厚重、深沉、幽邃的文学意蕴。这些作品通过对人物心灵世界的剖析和对生与死、贫与富的根源追问等,揭示着北方人典型的地方性格和处世原则;他们的命运变迁从不同侧面折射着地域文化精神及其在时代风潮中的嬗变。

但是,伴随时代进步,河北作家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也在不断调整,河北文学出现了新的变化。在以往的研究中,认为河北文学有着三次现实主义创作高潮,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的“红色经典”时期;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初期贾大山、铁凝、陈冲的创作;第三次开始于“现实主义冲击波”中的“三驾马车”,但却是在胡学文、刘建东、李浩和张楚所形成的“河北四侠”的创作中完成的。对此,我们应该注意,“四侠”的创作对于现实主义传统已经是相当大的断裂,特别是深受现代主义影响的刘建东和李浩,他们的“形式自觉”转向了对现实主义的解构。同样是河北的批评家金赫楠即说:“比如刘建东和李浩,作为河北当下最活跃的小说家,其作品的辨识度相当程度上关乎‘先锋’……刘建东则更迷恋和依赖‘荒诞’”。李浩在“先锋”之路上走得更加坚定,抛开从西方撷取创作资源的《外国故事集》《N个国王和他们的疆土》等作品不论,他新近的长篇小说《杜王传奇》所呈现的怪诞的寓言风格则去现实主义更远。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很难在传统的脉络上评价“四

侠”的创作——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文学”而不是“现实”和“河北”。表现手法和审美风格的变化表现了河北作家主动求新、求变的探索精神,在坚守传统的同时,他们不断尝试与现实建立新的伦理关系。毫无疑问,从“四侠”开始,河北文学在传统之上生长出新特质——这与商业、信息时代日渐同质化的时代生活和社会观念不无关系,地域文化已经主要内化为精神,器物 and 制度特征日渐消失。

因此,除了将河北文学纳入当代文学史序列中加以对照,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表现对象所蕴含的文化精神来揭示河北文学的独特性。这里并不是要重弹“题材决定论”的老调,认为作品中写了河北地域的生活就是独特的,而要注意到叙事方式特别是借助人物形象所表现出的情感和观念的独特性。以此观察,河北文学对地方生活和文化精神的表达既有鲜明的地域性和传统性,也有因时代变迁而出现的创新性变化。这其中,对时代精神的呼应和关切是最重要的美学品质之一。当代河北文学的三次现实主义高潮,在“内部研究”视角下是文学思潮和表达方式的变化,“外部研究”视角下则是历史和时代催动的结果。例如,《白洋淀纪事》《红旗谱》《平原烈火》《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红色经典的产生,与河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军民的战斗生活是分不开的,它们的作者都是从战场上走出来的作家,“他们个人的主体意识,与所处时代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他们的作品是作家个人独具个性的艺术创造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再如“三驾马车”的创作,以及关仁山的新作《白洋淀上》等作品皆是如此。作家历来对生活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倾听人民呼声、传递主流价值、紧跟时代潮流,是河北作家的自觉追求。

(作者系河北作协研究员、《诗选刊》杂志主编)

从“地域”出发——笔谈(五)

■ 评论

唯有真挚不可替代

——读潘峰长篇小说《天地扬尘》

□ 卓 今

在各路技术主义流行的趋势下,创作者真挚的情感越来越成为小说稀缺的品质。第一次进行长篇小说创作的潘峰对小说艺术却有透彻的理解,《天地扬尘》跳出了把技术当艺术的窠臼,真挚地讲故事,真诚地对待小说中的每一个人。小说以老人的回忆讲述为起点,场景回到讲述者的童年,以“我”为视角的完整的家族史徐徐展开。家族的枯与荣取决于国运的衰与兴,可以说,《天地扬尘》既是一部家族史,也是百年中国史的一个缩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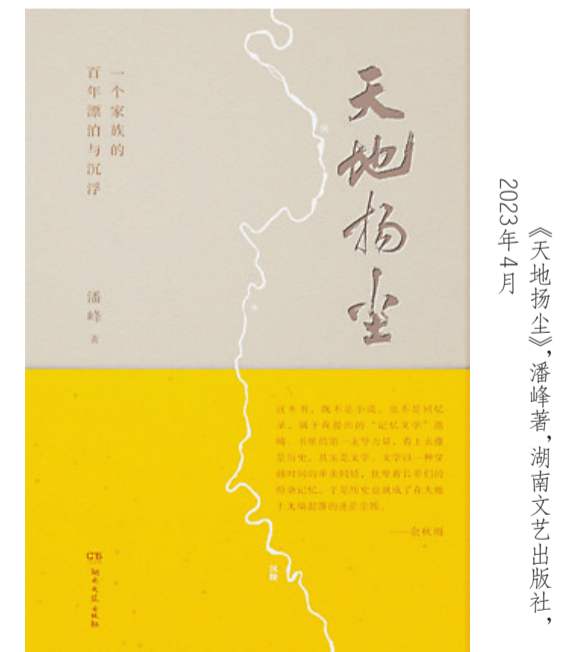
小说《天地扬尘》采用的是隐形的双作者叙事模式。文后的跋与正文对小说写作背景作了交代,叙述者“我”沈一尘的原型是作者潘峰的父亲潘一尘。潘一尘凭着超强的记忆,复述了自身的经历和百年家族史。书中沈家家族百年史是现实中潘家的家族史,按作者的说法是“带有少量虚构的家族小说”。小说中的“我”“天赋异禀,记忆力惊人”,大量丰满的细节和鲜为人知的事件使人忽略了小说结构上的想法。虽然是百年家族史,但情节并不复杂,叙述重点始终在沈一尘身上。作者简化了家族史的多头并进、情节复杂、人物众多的手法。“我”既是第一人称写法,也代表了该小说的“视角中心主义”的主张,强调镜头的移动感。因此,小说能够从容地展开内部的细节。沈良三、韩玉琴的婚姻以及他们的父母分别是安徽贵池人和当涂人,两人相识后因战乱辗转流离,几次遭遇土匪,先后到临潼、新宁、会同、洪江、长沙,从事政务、教学,落魄时靠人接济或打杂混口饭吃,最后落脚沅陵,以教书为生。沅陵被认为是沈从文的第二故乡,小说中沈家人住的“芸庐”就是沈从文在沅陵置的房产,这一细节也增加了小说的互文性效果。“我”的父亲是出身名校晓庄学校的高才生,他错过了去延安的机会,在湘西沅陵偏安一辈子。一同跑出来的几个小伙伴都去了延安,甚至做了高官。叙述者对父亲的遭遇带有惋惜,同时又生出幸运之感。母亲韩家家族是安徽当涂“钟鸣鼎食”之家,外公燕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留学日本,参加过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外婆则是日本人。“我”的母亲因一半日本血统备受歧视,养成了孤独坚韧的性格,也因此饱读诗书,在沅陵县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沈一尘兄弟姊妹10个(包括1位同父异母哥哥)开枝散叶,逐渐

发展成为一个事业兴旺、人口庞大的家族。“油菜花开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来了。”抱着这样的期盼,小说中九岁的“我”在广袤的油菜地里等待失散的家人,一等就是一个星期。小说的第一章充满魅力,这个单纯而诗意的场景奠定了小说的艺术写法。沅陵城外,满山遍野举着火把的土匪即将攻城,“我”在兵荒马乱之际与家人走散。老蒋的车带着“我”到了150公里外的桃源县。小说整体上都带着这种美学气质——一种忧伤、优美的格调,几乎所有人物在困难面前都爆发出顽强的生命力,给人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

小说第一章之前还有一个“开篇”,相当于序,交代了耄耋之年的叙述者是以回忆的方式展开情节的。历史大事件带动着人物命运,常德会战、长沙会战直接导致沈家的迁徙、失业等,沈家的亲戚朋友直接参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大运动沈家人也都卷入其中。书中所写的重大历史事件有些作为背景,有些则正是一家人的生活本身。

伴随着一家人的命运沉浮,湘西沅陵鲜为人知的大小历史事件渐次呈现出来,犹如翻开尘封的历史残卷。小说整体洋溢着对家乡的热爱,叙述者不计较曾经在这些地方遭受的伤痛,依然热烈地热爱它们。小说详细叙述了沅陵的地方风物 and 传统习俗,其在文化地理学上与地方志、文献基本相符,通过人物故事展示了神秘、丰富的沅陵文化。20世纪初著名的“辰州教案”就发生在沅陵县城,“辰州教案”后西方传教士用赔款修建了永生堂、天主教堂和诸多的牧师楼,沅陵也成为湘西诸县中较多接触外来文化的地方。龙兴讲寺、二酉观、芸庐都成为小说重要的文化意象。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如阳戏、侗戏等都在小说人物的日常生活中。小说还将现代医学与苗医的辩证关系通过人物命运体现出来,“我”身上长了毒瘤,西医诊断要截肢才有救,苗医却用草药治好了。日本的水谷医生因此迷上了中国的中草药。美丽的自然风光也刻在叙述者“我”记忆中,桃花源、崑山、沅陵的山山水水,安徽老家的徽派建筑,贵池、当涂的风景,所有这些都是叙述者“我”热爱生活、热爱家庭的理由,而让“我”热烈地活着,在困难面前永不放弃的根本所在是众多亲人和朋友。

作者将自己真挚的情感灌注在每一个人物身上,



注重挖掘人的本性,即便一笔带过的人物也个性鲜明,书中没有大恶之人,哪怕土匪也是复杂多面的人格。作为知识分子的父母,他们的行为操守、坚韧和温婉的人格影响到周围的人。父母带领一家人淌过人生所有的激流险滩。“我”从小执着而充满梦想,始终积极向上,但也有犯浑的时候,“文革”中出于自保,“我”将前来看望自己的父亲拒之门外,书中写到“我”的悔恨这一节,比所有的苦难都令人悲伤。“我”与徐敏漫长的、让人担心“成不了”的爱情最终结局圆满,作者对每位笔下人物的爱、怜悯和宽容体现在细节中,大慈大悲的保姆师,不计得失任劳任怨的沈家帮佣老婆婆、被贪欲迷障的苦命的王嫂、老实人老蒋、仗义的秦家房东家及她的孩子旺子,深得民众拥戴的女匪首田芸,救“我”一命的戏台上的关公、放映员兼土味配音师老谢,以及盘古、吕班长、江兴等。作者真挚地爱惜他们,用心塑造他们,慨叹他们的命运。

潘峰对语言有超强的领悟力,他的语言艺术整体上是收敛和克制的。有些看起来是闲笔,实则包含很深的隐喻。湖南和平解放时,“父亲说:‘变天了’,我跑到边上的龙头井,发现并未如传说中所说的改天换地就会断流,雕花的龙头依然清水如注,汩汩有声,宛如美妙音乐。”作者用很诗意的笔调畅想历史巨变,表达对美好的新中国的期待。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文学名刊 主编谈



“这个时代的文学期刊不仅要充当写作评判尺度和涵养文学生态的湿地,还要让文学精神照进更多读者的现实生活,否则,它的存在价值就会被各种新媒体新资讯稀释”

文学期刊是作家的,更是读者的,这或许是文学期刊亟需重温的初心。

我是8年前接手《星火》的,一本没有什么资源优势的省级文学期刊如何从纸媒衰退的大势中突围,并活出自己的气质和魅力?这个巨大的难题让我暂时放下了个人的文学创作,全身心地思考并一步一步地探索实践。

从2016至2017年,《星火》走的也是作者路线。经过不断向名家约稿,《星火》的转载率有了一定提升。但是,我明显感觉到,订刊的人读刊的人,大多是想上《星火》的作者,真正的读者很少,作品的传播基本是作者之间的内循环。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只围绕作者办刊,小说稿费标准不算高的《星火》没有任何优势,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即便能偶尔拿到特别好的作品,也基本只有同行才关注,很难形成有效的社会传播。因此,读者流失和小圈子里的内循环不是单靠名家助力就能解决的。如果缺少有效传播,文学期刊的社会效益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作为江西省文联主管主办的文学期刊,不能只为有限的作家服务,还要成为文联延伸服务手臂的试验田,成为涵养、改良本省文学生态的湿地。2018年之后,《星火》开始尝试在人群中寻找热爱文学的“无限的少数人”。我们先通过微信群把挚爱《星火》的一批读者组织起来,请他们当读者星探,在每一个订户相对集中的区域建立一个读者驿站,牵头人叫驿站长,之所以叫驿站长不叫站长,是为了去行政化,避免牵头人把这个身份当个官。驿站长负责驿站的日常运营。每个驿站有微信交流群,驿站长齐聚的群叫驿站长村。

从2018年开始,60多个《星火》读者驿站遍布全省,覆盖了江西大多数县区。省外也有少数《星火》驿站分布。编辑部把驿站长微信群作为驿站的培训平台,以精神引领、写作提升等多种方式服务驿站长。驿站长再以类似的方式在本驿站的群去服务更多驿友。《星火》编辑部和驿站长之间没有经济利益。驿站长们都是文学义工,没有任何物质回报。驿站长和《星火》是互相成就的双赢关系。驿站长微信群不允许发红包和犒劳,但是热度持续了五年仍不衰,并派出火炬村(由各驿站里擅长新媒体宣传的年轻人组成)、《星火》朗读者群(由义务给《星火》公众号朗读作品的朗读爱好者组成)、《星火》锐评团(评论爱好者)三个群。

通过读者驿站发现的读者,大多是《星火》的“真粉”和“铁粉”,《星火》公号推出的文学作品和短视频、音频作品他们都会主动转发,很多年轻读者还背着《星火》背包,带着《星火》杂志和《星火》灵感本等《星火》文创产品到处旅行打卡。目前,《星火》读者们的打卡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国外也已去到十多个国家。读者意识改进了《星火》办刊思路,我们坚持从公共邮箱选稿,逐渐形成《星火》办刊特色。

每年都有数千名文学青年们在《星火》驿站里聚集,他们参加《星火》驿站写作训练营、评委会、读书会、朗读会。他们不仅对《星火》的宣传和推广很热心,把《星火》当成“我们《星火》”,驿站里读者们的真实心声,对《星火》办刊理念也影响深远。基于对海量评刊信息的科学分析,我们发现,那种取材于作者直接人生经验或社会观察,经历了十年磨一剑的沉淀和发酵后把个人经验和时代烙印融为一体的散文特别受读者欢迎,因此,《星火》杂志从2019年开始面向全国征集第一手经验散文,并创设“原浆散文”栏目,经过四年多的积累,“原浆散文”栏目已成为《星火》的招牌菜和特色菜,大量作品被《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转载,被《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关注评论,在全国散文界有口碑,在读者心中有期待。

当很多未名作者不再信任一些杂志的公共邮箱,感觉投稿无门时,我们意识到,认真对待公共邮箱里的每一篇来稿,将有利于修复基层作者对文学期刊的信任,同时,帮助正处于“蝉的地下时光”的写作者在文坛发出响亮的“第一声”。为此,我们编辑以淘金者的耐心从自然来稿里选稿,并为此开设“第一声”(处女作)和“蝉的地下时光”(作者自述)栏目,大力推荐省内外文学新人。目前,《星火》每期发表的作品,选自公共投稿邮箱的比例在70%以上,有的栏目比例高达90%。

这个时代的文学期刊不仅要充当写作评判尺度和涵养文学生态的湿地,还要让文学精神照进更多读者的现实生活,否则,它的存在价值就会被各种新媒体新资讯稀释。因此,除了日常编刊,我们还借助江西优质生态资源,坚持以文艺的方式做文艺的事的原则,策划组织各类文旅结合的文学生活。比如:每年一届的“香樟笔会”、每年一届的“稻田写诗农耕体验笔会”、每年一届的“星火文学年”,不定期举办“把《星火》读给你听”“请你读《星火》”等户外朗读会,并通过短视频等各种方式传播,在文学圈内外都产生了较大反响。

《星火》驿站的活动大多以费用AA制的方式开展,参与的人反而特别珍惜和投入。有时,同一个周末,三四家驿站在不同县市开展活动,有时一二十家驿站从四面八方聚到某个山清水秀的中间,点茶采风交流。《星火》笔会也不搞排资论辈,一切回到文青聚会本来的样子。我们不拍主编坐前排C位的大合影,在微信群里现实活动里,主编、编辑和朋友们都只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文艺青年。

《星火》的活动重创意和策划,但谢绝一切形式主义和噱头。我们上火车,上古城墙,上高山,去浮桥边寻找读者,以最真实自然的状态走向大众,不少陌生人被我们的质朴和热情感染主动参与互动,有些人因此成为《星火》驿站的新成员。最初,加入驿站的大多是写作爱好者,后来,各行各业喜欢阅读和文学生活的人也纷纷订刊加入《星火》驿站。

《星火》驿站创建近五年多来,一批批基层文学爱好者在这里成长,有的年轻人成长为本省“80后”“90后”作家的代表性作家,很多人的作品登上《人民文学》《诗刊》《散文》《散文选刊》等刊,有的成为全省最年轻的县作协主席。更多的文艺文艺审美、文艺技能不断提升,在本职工作之余也得到更多的认可。对于很多人而言,《星火》已不仅仅是一份刊物,更是繁杂日常中一个美好的角落、精神的家园。

(作者系《星火》杂志主编)

新时代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

中国作协创研部 文艺报 主办

认真对待公共邮箱每一篇来稿,修复基层作者对文学期刊的信任

□ 范晓波

